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III
十年风雨
SHINIAN FENGYU
1966-1976
修订本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3, 十年风雨/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1 (2009. 8 重印)
ISBN 978-7-220-06676-4

I. 中… II. ①郭…②王…③韩…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49~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168 号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

——十年风雨(1966—1976)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主编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周 颖 叶 勇 唐海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祝 健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37.25
插 页	3
字 数	628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6676-4
定 价	298.00 元(全五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目 录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郑 谦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再发动	安建设 (17)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卜伟华 (38)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卜伟华 (70)
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	安建设 (91)
“二月抗争”及批判“二月逆流”	安建设 (113)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	邓礼峰 (132)
刘少奇冤案始末	黄 峥 (155)
中共九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确立	金春明 (177)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	李丹慧 (198)
60 年代末的战备高潮	郑 谦 (215)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	郑 谦 (230)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刘小萌 (245)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周全华 (279)
林彪集团和林彪事件	于 南 王海光 (302)
70 年代初期的“三个突破”与调整	陈东林 (325)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 (342)
邓小平再度复出	安建设 (369)
中苏分裂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	李丹慧 (389)
中美关系的突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	宫 力 (405)
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国援越抗美的战略调整	李丹慧 (426)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王海光 (452)

“学理论”与“评《水浒》”运动 王海光 (470)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张 化 (491)

1976 年的“四五”运动 张 化 (511)

“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思潮 印红标 (528)

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陈东林 (567)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郑 谦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的抵制。在彭真主持下起草、并经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同意的《二月提纲》，试图对日益升级的学术批判活动加以限制，但被认为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很快，《二月提纲》也受到批判。从对《海》剧的批判到《二月提纲》的发出，从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自1957年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过一系列量变，终于发生了一个全面的、质的飞跃。以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为标志，文化革命开始转变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尽管它还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

批判《海瑞罢官》的缘起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只是在10多年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江青此行，是为了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谁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从1962年起，长期称病赋闲在家的江青不甘寂寞，开始“过问”文化艺术

方面的工作。她一出马就不同凡响，一口咬定舞台上、银幕上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因而当时文化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已经有些过头的批判已经不适应斗争的需要。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实现她的“抱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阻力很大”。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江青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其目的，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其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

江青的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江青 1962 年就提出要批判《海》剧，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位文艺评论家去写，但也被婉言拒绝。这些都使她增加了对中央一些部门的仇视。

在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支持下，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在江青、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以长于写批判味道十足的文艺评论文章而著称。此前不久在对周谷城先生的批判中，他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的批判更是与众不同。

姚文元受领任务后，从 3 月初起，开始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着手写作。由于他对历史特别是明史完全是门外汉，又找人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关资料。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张春桥又找了几个心腹参加讨论。讨论中，当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将《海》剧中“退田”等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的时候，张、姚都莫测高深地不置一词。

姚文元的文章刚一发表，一些有政治经验的人便感到它与当时许多批判文章的区别，因为它与 60 年代初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联系十分明显。姚文十分荒谬地把写成于 1960 年的《海瑞罢官》一剧中“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 1962 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文中写道：

“1961 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那位作家的笔下

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所批判的《海瑞罢官》，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一个反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早在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在总结“大跃进”中“浮夸风”的经验教训时，许多人都谈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海瑞不惧权贵、刚正不阿的精神，提出要学习海瑞，宣传海瑞。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吴晗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和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对上海会议关于要学习海瑞的讲话作了修改，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他认为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0年，吴晗写成《海瑞罢官》的剧本，主要描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的事迹。此剧1961年1月开始在北京上演。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单干风”（即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翻案风”（即纠正一部分干部、群众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所受到的错误处理）和“黑暗风”（实际上是对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实事求是的而非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估计和报告），对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时期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表示不满。他还因此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并把这些观点上升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兴奋起来。她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对此，毛泽东开始时是不同意的。1964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有关。这些言论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于是便“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①。显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矛头并不限于吴晗。从开始构思起，就是以某些中央领导同志为批判目标，要触及1962年甚至1959年以来党中央领导层内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正因为如此，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整个写作活动都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3页。

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江青后来说，之所以要对其他中央领导人保密，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因不知道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 10 多天后，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报刊均未转载。文艺界、学术界一则不知其底细，二则畏其来势汹汹，大多以沉默的态度对待它。其他部门和领域里的人们，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中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予重视。但没多久，学术理论界对姚文蛮横无理、无限上纲的普遍反感便反映出来，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姚文的不满。

姚文发表之后，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惊。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党员，《文汇报》点名批判这样一位知名学者，为什么事先一点风也不向中宣部、北京市委透露？1965 年上半年中央五人小组^①已经指示，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为什么姚文一下子就给吴晗、《海》剧戴上那样大的政治帽子？这样的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11 月中旬，北京市委和《人民日报》等分别向上海方面了解情况，但因江青、张春桥下令《文汇报》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

本来，姚文元未经过任何中央主管部门，就点了一位知名学者、一位北京市负责人的名，并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是不符合党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而且，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北京和其他各地报纸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但是，那些有来头的发难者却为此大动肝火，他们立即添枝加叶地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11 月 20 日，毛泽东要上海将姚文印成小册子，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在征订发行数时，北京新华书店征订数很少。这样，在姚文发表 10 天内，由于江青、张春桥等的欺骗和挑拨，围绕着“转载”的问题，使毛泽东发展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1 月下旬，彭真由外地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转载”问题。他先后对《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委表示，关于发表批判吴晗文章的问题，中央报刊还

^① 这个小组是 1964 年下半年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经中共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

要考虑一下再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并几经讨论后，决定有条件地转载姚文。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根据彭真指示写成的编者按中指出：“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等等。11月30日，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中转载了姚文，这种安排本身就表明了不同意对《海》剧进行政治批判的意向。《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显然，编者按的基本倾向与江青等人借批判《海瑞罢官》做政治文章的意图是大相径庭的。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少量批驳姚文元文章的稿件。无疑，北京方面的这种态度是很不合江青等人的口味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的谈话中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认为它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要害”从“退田”变为“罢官”，仅仅两字之差，却使得《海》剧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增加了。对《海》剧的批判已经十分明显地与1959年庐山会议、与60年代初围绕着调整工作所产生的分歧联系起来，与对中央一线的不满联系起来。从更深处讲，它反映了党内、党中央内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从11月10日姚文的发表至12月21日，在40多天的时间里，北京方面对姚文的态度，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认识。而且，“要害”升级之后，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对批判《海》剧采取抵制或消极的态度，谁就会成为新的、更大的“要害”。

12月下旬后，由于点出了“要害”问题，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1966年初，在文艺批评中搞牵强附会、唯心主义“影射学”的恶劣风气迅速蔓延，批判运动范围不断扩大。批判不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和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

《二月提纲》

在批判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各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报到了中宣部，要求指示、解决。当时，中宣部虽然不能摆脱“左”的影响，但与江青等人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希望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限制各种极左行为，控制运动的发展。1966年1月中旬，已经知道姚文背景的关锋、戚本禹先后把自己批《海》剧“政治要害”的文章交中宣部。中宣部要求他们改写，把批判的调门降低一点，但他们却态度强硬地拒不同意。中宣部只得将此事上报五人小组处理。在此期间，中宣部先后送了4篇有关文章的政治性提法的摘要上报请示，这就是后来《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扣压左派稿件”。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任何试图对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的努力，都有意无意地、直接间接地得罪了江青、张春桥这一伙“左”派。

对于这场政治批判，除上海市外，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都感到无所适从，迫切需要中央拿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下一步的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如何处理运动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为了研究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在发言中指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并否定了关锋等对邓拓的诬蔑。会议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虽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去反驳“要害说”，但它却通篇不提“要害”二字，并用各种形式规定了运动的学术批判的性质和范围。

《二月提纲》的这一中心思想，再一次给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以有力的限制，它也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不难想象，当时的运动如果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规定进行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在几个月之后爆发，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将不是对《海》剧的批判。

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会后，《二月提纲》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因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二月提纲》于2月中旬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根据这个《二月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二月提纲》的出现反映了当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迅猛发展时，党内和知识界相当多数同志所持的消极抵制态度，表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央领导层受到抵制。《二月提纲》的发出使全国学术批判的形势有所缓和，“左”派无限上纲的文章被主管“压”下了，从政治上批“要害”的文章少了，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讨论的成分增加了，文学艺术界又稍稍松了一口气。正如张春桥在几个月后所说，《二月提纲》的发出，“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

2月中旬以后，在贯彻、执行《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已从对《海》剧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与《海》剧相联系的政治问题从彭德怀发展到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斗争的对象，从《海》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这也就是说，《二月提纲》发出之后，江青等人的注意力已不在对《海》剧的批判，而在于由它所“暴露”出来的在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了。《二月提纲》的发出，成为矛盾升级、转换的关键，对《海》剧的批判，迅速、明确、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

江青、张春桥等人从《二月提纲》中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可能得到中央有关部门以至中央一线领导的支持。但是，《二月提纲》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张春桥等一时不知底细，不便立即发作，姚文元甚至已经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为《文汇报》

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做结束运动的准备了。当然，江青等人不情愿吞下这颗苦果，对于《二月提纲》中所说“学阀”、“以势压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话，他们更是耿耿于怀。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8日，当彭真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但这并不表示他同意《二月提纲》的观点。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通过另一条途径，用另一份重要文件，实际上否定了《二月提纲》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得到林彪“完全支持”的江青，邀请部队四位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开得既仓促又奇特。会前，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不知道要座谈什么问题，无从作任何准备。会议名曰座谈，但既无日程安排，又没有固定的议题，每天的活动都由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座谈会往往是先看电影，边看边听江青发议论。所谓座谈会，其实是既无军职也无党政领导职务的江青，用林彪个人委托的名义谈她对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和对一些文艺作品的看法。会议第一天，她实际上针对《二月提纲》和当时对《海》剧的批判，对文艺方面的问题谈了一通看法：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尚未到来，等等。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此次江青召开座谈会的主题和基调。根据座谈内容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30年代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的积极作用，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提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个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将纪要的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外，他还加写了

诸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等等。“纪要”还提出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根据林彪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学习、检查的制度。“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按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整个文艺战线。

“纪要”的形成，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发展为猛烈的政治运动。“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严重性在于，它不仅整个地否定了建国后文艺界的成就，而且很快就成为“左”倾错误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突破口，为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工作成绩，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是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互相利用，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开始。还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到苏州与林彪密商，得到林彪的“完全支持”。1月22日，林彪在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中对在部队本来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作了吹捧：说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江青则在“纪要”中吹捧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江青后来露骨地说，她去找林彪，是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挑拨和歪曲的汇报，随着“纪要”的定稿，毛泽东对文化界阶级斗争的估量更加严重。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彻底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了实权，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实际上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二月提纲》的起草者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不满也在进一步加深。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

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还说，十中全会作过决议，要在全中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他还强调：文化革命能不能坚持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得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

这次讲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就拿出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给《二月提纲》罗列了三点意见。4月2日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要害”的文章。自此，报刊上批判的调子又提高了，态度也更为激烈了。4月上旬，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开始被公开批判。此风一开，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各自的“三家村”、“四家店”。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先后在会上发言，批判彭真在学术批判中的态度和历史上的“错误”。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4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从对《海》剧的批判到《二月提纲》的发出，从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1957年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过一系列量变，终于发生了一个全面的、质的飞跃。以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为标志，文化革命开始转变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尽管它还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

党内高层接连爆发的严重政治事件

“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毛泽东从60年代起越来越紧迫地思考的一个问题。从20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思想

是深刻的。在他去世后的10多年中，苏联、东欧等国的剧变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证明了他有关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有远见的。但问题在于，由于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着的一些误解，使他把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当成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性质的东西，认为提出这些方针的中央一线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随着调整的深入和党内两种趋向的发展，他有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不断加深。1965年9月至10月间，在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在毛泽东因这种误解而渐渐疏远中央一线领导时，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乘隙而入。他们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投其所好，制造事端，挑拨离间，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又为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就在批判《海瑞罢官》并由此升级到对《二月提纲》的批判这一段时间里，在党内高层又接连发生了几起震动全党的严重政治事件。1965年11月10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其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别人抄录”等。其实，这些罪名都是康生、江青等的诬陷，完全是强加的罪名。所谓抄录档案问题，是由于编写党史、军史、战史的需要而对档案资料的正常利用，事先均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手续，并不存在“泄密”问题。可是，这些正常的工作当时却被怀疑为“里通外国”，成了制造冤案时捏造罪名的根据。

紧接着这一事件，善于窥测风向的林彪开始了行动。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并让叶群带着他们指使别人写的几份诬陷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的材料去上海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12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认为罗瑞卿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应当有所警惕。12月上旬至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诬陷材料，并以强加的“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罪名将罗瑞卿隔离审查。在批判《二月提纲》的过程中，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对彭真进

行了揭发批判。与此相联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也难免厄运，他被加以诸如“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立场和观点上同彭真完全一致”等各种罪名，随即被停止了工作。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同志突然间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的震动。接连发生在党和国家高层的严重政治事件，在党内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使全党绝大多数人不能不接受当时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系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强有力地推动着已经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推动着由意识形态领域发端的“文化革命”不可避免地转入政治领域。这些事件的发生，也为江青、林彪、康生等野心分子进行阴谋活动，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从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在对全国形势的认识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越来越激烈，而且中国已经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自从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以来，他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一系列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从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到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从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从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到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等等。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半年实践的发展又使他对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更加严重。1966年3月，毛泽东在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同意提出文艺界已经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此之后，他又陆续提出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据此，他认为这半年来进行的各种斗争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所以，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这样的阶级斗争过去虽然做了一些，但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做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在毛泽东防止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思考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接班